

孫奇逢哲學思想新探

李之鑒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孙奇逢哲学思想新探

李之鉴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孙奇逢哲学思想新探

李之鉴 著

责任编辑 陈洪远
孟 清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

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625 插页:4 字数:342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2000 定价:15.00 元

ISBN 7-81041-025-3/B·43



夏峰先生七十九岁画像

“凭君摹写肥和瘦，颧颊恰如八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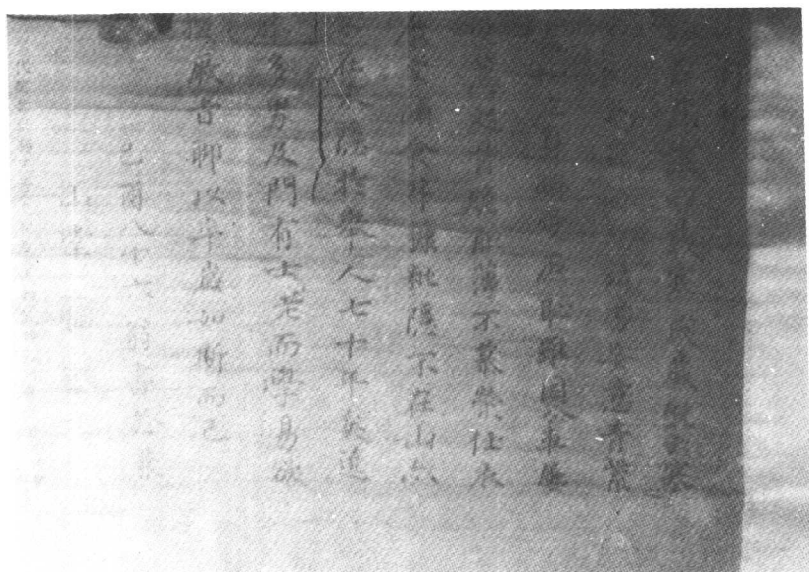
“春光不入老来颜，引镜拟图疑似间”

自注“姬山人予写真”

康熙元年(1662)三月十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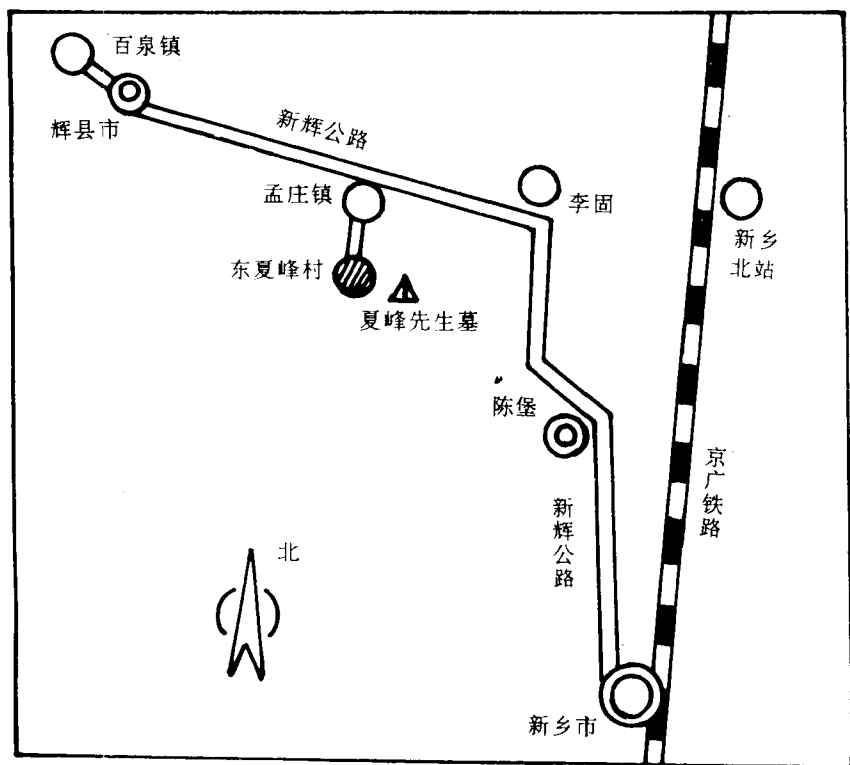
孙奇逢画像



孙奇逢手迹



作者同孙奇逢十三世孙居富(右一)十四世孙中全(左二)中法(左一)合影



东夏峰村座落示意图

序

孙奇逢(1585—1675)字启泰,号钟元,河北容城人。晚年移居河南辉县夏峰村,人称夏峰先生。他幼承家学,14岁补博士弟子,17岁中万历二十八年举人。与兄奇儒、奇遇,弟奇彦,皆砥砺名行,为同辈所推重。与定兴鹿善继为友,即以圣贤相期互勉,不作寻章摘句之学。生平期于自信,不以穷达易志,亦不顾世俗是非,“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实为夏峰一生写照。

夏峰生活在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时代。明朝晚年政治腐败,如天启年间阉宦魏忠贤擅权,毒害忠良,左(光斗),魏(大中)等均遭诬陷,夏峰早年即以豪侠著称,曾为乡里打抱不平之事。左、魏事发后,他与鹿正、张果中即奔走营救,不畏谤议,海内称其高义,誉为范阳三烈士。夏峰以朝政败坏,故拒不为世用,征召不出,时号为“征君”。

夏峰虽不出仕朝廷,却并非不关心国家大事。他不是那种“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只会空谈心性又是无能的腐儒;而是在力所能及之内,以拯溺斯民为己任的仁人义士。如崇祯九年,清兵入侵京畿,逼近容城,夏峰率宗族邑人守御,近邻城邑均沦陷,而容城却得以保存。到后来清兵大举入关,天下变乱,夏峰乃率子弟门人及友邻等约六七百家,入易州五公山,筑寨山中而居。在此外修武备,内立法纪五条:严同心,戒胜气,备器具,肃行止,储米豆,即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做好准备工作。由于远近归附,上下同心,在夏峰主持下,得以渡过战乱难关。厚爱亲朋,和睦邻里,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在此干戈扰攘之际,而夏峰能带领众人,实践此传统美德,可见其才智自有过人之处,当非死读经书的儒生可比。

我这里先讲夏峰的为人，正以此反观其为学。由于夏峰服膺阳明良知之教，离不开象山所倡“心即理”的根本命题。他声称“吾心即天地万物”，“惟此一心为万化之原”。到晚年仍在申言：“理总是吾心之理”，“心体本明”，“故当求理于心”。从哲学体系来看，自不免堕入主观唯心论的窠臼。但从夏峰一生为人来说，他并非师心自用和凭自己主观任意胡来的人。他从不以“生知”自许，而是学到老、做到老，才能此心少明。他说：

七十岁功夫，较六十而密，八十功夫较七十而密，九十功夫较八十而密。学无止境，此念无时敢懈，此心庶几少明。……视听言动，无非礼，子臣弟友能尽分，戒欺求谦，此是圣贤真境界也。（魏环极撰《传》）

夏峰强调后天学习，学无止境，学愈进而心愈明。他另处又说：“行无不懂之时，则心自无杂念之扰。”（《答问补遗》卷下）由此可见，夏峰并非只讲纯粹先验之心，同样亦要受后天学行所制约。虽然他也说过：“心外无学，不动心是第一义。”其实这里所谓“不动心”，即是我们今天说的坚定性，是人必须要有自信心的表现。

饥饿穷愁困不倒，声色货利浸不倒，死生患难考不倒，而人之事毕矣。

能处人所不能处之事，能忍人所不能忍之辱，能堪人所不能堪之忧，则其中必有大过人者矣。遇事便束手，被辱即动心，逢忧辄短气，人可得而颠倒之，驱役之，儒生俗士之浅浅者耳。

（《答问补遗》卷下）

夏峰这两段话，说明人生要有坚定的志向，如果遇到困难就动心短气，就会受人摆弄。夏峰一生经历无数坎坷，但他能从容对付，做到心静神闲。他说：“贫贱人役役于衣食，境固不闲，心何能静？富贵人扰扰于名利；境愈不闲，心何能静？”“心非以无事为闲，心非以无事为静，直能行所无事而已，此所以难。”（《语录》）人心不能不受外界影响，但也要经得起干扰，即要做到不动心。从精神与物质的关

系来说,做到不为物役,这当然很难,但夏峰是做到了,这可以说是唯心论,但也是他精神过人之处,表现出人格上的特色。

夏峰是很有个性的人,同样也尊重人家的个性。他虽承传阳明心学,但晚年读程朱之书,却并无门户之见。他说:

学问一事,原不在寻行数墨,较量字句之间。建安,姚江皆法孔孟,虽若不同,俱非立异。我辈只要眼阔心虚,实求自信,不必拾人颊吻,随人转移。

诸儒学问皆有深造自得之处,故其生平各能了当一件大事。虽其间同异纷纭,辩论未已。我辈只宜平心探讨,各取所长,不必代他人争是非,求胜负也。一有争是非,求胜负之心,却于前人不相干涉,便是己私,便属浮气,乌能近里着己真切了当自己性命。《(理学宗传序)》

夏峰对做学问,尊重各家各人的深造自得,他的态度是取其所长,但不为别人争是非胜负,因为这样容易渗杂自己的私见。如有人认为夏峰之学是调合朱、王两家,其实他不是和稀泥,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两家的长处和短处。他认为“门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之事物之际,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歿而天下之实病不可不泄;词章繁兴,使人知反,而求之心性之中,阳明之功也。然阳明歿而天下之虚病不可不补。”这里讲两家得失比较客观。他说不必代他人争是非、求胜负,其实他已指出两家长短得失之处,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胜其所当胜,负其所应负,这里也有是非胜负问题。至于“争”和“求”,他是将两家思想摆在公平竞争的地位,而实事求是地给以评价。他不是凭个人主观而阿私所好。夏峰无论为学与作人,既是有原则的,又是开放的。他充满自信,不舍己从人,不为物役,是谓不动心。但他又是尊重别人,取其所长,不强人以从己,此可谓之处公心,两者之间是辩证的统一。

以上如果算是为李之鉴同志《孙奇逢哲学思想新探》一书写的序言,似乎有点不符体例,但也不是与本书无关。之鉴同志在 1985

年接受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点校《孙奇逢哲学著作选》的任务与1986年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撰写《孙奇逢学案》任务之后，萌发对夏峰思想的研究，从而草成《孙奇逢哲学思想新探》的初稿。由于他看到有关论及孙氏的一些文章，内容偏颇失实，为要掌握更多材料，他继续点校孙氏几部哲学著作，在此基础上写成《新探》第二稿。其后为要进一步研究，一面对书稿推敲其每个关键性论点和命题；同时陆续发表有关研究论文，与学术界同行商讨，在此基础上再写成《新探》第三稿。然而之鉴同志还觉得意犹未尽，最后继续重点探讨研究后，修改成现在的第四稿。

之鉴同志为写好这部学术专著，历时八载，四易其稿，由此可见作者治学态度的认真及付出多么艰苦的劳动。当然这些功夫是不会白费的，经过广泛收集资料，深入研究课题，反复进行商讨，对夏峰为学与为人的认识，才能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终于写成这部全面、系统的学术研究专著。我们平常说要知人论世，即使对在世者也不容易，何况几百年前的古人。之鉴同志所以花大气力研究孙夏峰的哲学思想，自然不是为发思古之幽情。他的是要批判继承这份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借鉴。

对之鉴同志这部著作的内容，我这里不多作介绍，读者可对原书进行品评。但夏峰哲学作为传统的思想文化遗产，如要做到古为今用，就不要只停留在一些概念、范畴的认识上，而要察其言观其行，为学落实到为人。哲学是讲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中国特别是儒家重视的是后者，并要做到言行一致。只有具备这样的思想行为，才能给后人以启迪。我在序言中所以先写夏峰的为学与为人，只是想为本书作个引子，至于能否对读者有点帮助，这就等待大家的评判了。

李锦全

1993. 7. 20

序

孙奇逢是我国明清之际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品德高尚，大节凛然，又是一位足以垂范后世，令人崇敬的豪迈志士。发掘和研究他的思想，无疑对丰富明清之际哲学思想和优秀传统文化，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

明清之际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和剧烈对抗的所谓“天崩地解”时期，在学术思想上却呈现一片云蒸雾蔚，俊彩星驰的景象。孙奇逢生活在这一时代，也是这一时代众多闪耀光辉的星座之一。

明清之际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一暂短时期，然这一时期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却是一个重要阶段，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如果从孔子或周公开始，到近代帷幕拉开之前，一般都承认有三大高潮：先秦诸子学、宋明理学和明清之际哲学。也有认为应加两汉经学、魏晋玄学或隋唐佛学的，称五大高潮或六大高潮。无论说几大高潮，都肯定明清之际哲学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在这一时期，哲学思想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它综合和总结了自先秦以来我国优秀思想文化，把中国古代哲学推向高峰，为近代思潮登上舞台开辟了道路，又使中国文化保持了自身的特质。文化是一个包含广泛内容的领域，哲学则是文化的基础，是文化中的核心，是深层文化，它决定其他文化的性质、发展路线和方向。我国传统文化不可否认有不少的封建糟粕，对之，今日应毫不留恋决然抛弃它。然而，文化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和积累的成果，具有普遍性，其作用不能局限于某一窄狭区域或暂短的历史时期，更不为某特定

阶级、集团专有。因此，也不能不承认，其存在的精华，是可以为后世所继承并藉以创新的。像我国这样一个众多民族的国家，文化延续了数千年而不中断，在世界史上也属少见。如果我们的文化尽是糟粕，而在这块黄土地上繁衍生息，能长期保持昌盛不衰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文化精华是主要的，居于主导地位，才有强大的凝聚力。这凝聚力的强度，就在于传统文化中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不断进取的日新思想，自强不息的创造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务实作风等等。这些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思想精神，从其深刻的实质来说，又立足于我国古代哲学早就提出的明“天人之辨”上，即洞悉自然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界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关系。探讨人在自然界中的何种地位，包含了世界观、认识论，唯物唯心是这一探讨的两种途径和方法。所以“天人之辨”应是哲学根本问题，只有在明“天人之辨”的基础上，才能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我国古代哲学在世界观、认识论上的自然主义、理性主义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由此推衍到社会历史观方面则体现了人文主义和民本论。我们应坚定地唾弃民族虚无主义和国粹主义，立足于时代前进的高度和深度去考察我国古代文化和哲学的实质。过去的若干年来出于极其偏颇之见，对待文化遗产亦极其偏狭，在西方思想冲击下，把封建糟粕误作传统文化的全部，而加以否定，以致忘了自己的黄皮肤是祖先传留下来的，这是无法更改的，更改了，此即非此，而为彼了。

我国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们都能在总结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王夫之有诗句：“徒向故纸唯糟粕，欲扫讹书苦校讐。”“六经责我开生面”。既区别了精华和糟粕，又主张在发掘、继承精华的基础上进而创新。深刻研究明清之际思想家诸如孙奇逢等的思想，有助于我们较全面准确把握我国传统文化的实质。

明清之际思想家们都各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取得了不同的成就并放出自己思想异彩。孙奇逢作为这一时期一位负有盛名的硕儒，

北方奉为“泰山北斗”、“中原文献”，曾与黄宗羲齐名，时人称“南黄北孙”。又在王夫之蛰居瑶洞不为世人所知时，孙奇逢与黄宗羲、李颢并称“三大儒”。顾炎武慕其名，于康熙三年（1664）访孙奇逢于其躬耕隐居的苏门山。要了解孙奇逢亦不愧为明清之际一位思想家，不妨先看看这时期学术思想方面一些绚丽的花朵。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不持门户之见，以开明的学术观点，总结了明代学术思想史。特别是他的《明夷待访录》，清算了封建专制制度种种罪恶，启迪了民主思想。他大胆地突破纲常名教观念的束缚，否定君权神授的神秘思想，用“利”与“害”的观点，论证了君权的起源与实质，谴责“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供一己之淫乐，化天下之利为一己之私利，成为天下之人的“寇仇”、“独夫”。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认为人民应是主人，君主只该是“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者。顾炎武的《日知录》，包括经义、政事、世风、礼制、艺文、历法、兵事、天象、术数、地理等广博内容。他对“亡国”、“亡天下”作了区别：“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至于率兽食人，人亦相食，谓之亡天下，”唐甄在《潜书》中谴责“帝王者皆贼”。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民族利益是“古今之通义”，高于君臣的一时之大义。这些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爱国思想和反专制的民主意识。顾炎武又在《亭林文集》中提出“引古筹今”的经世致用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强调“多学而识，行必有果”，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朱之瑜以“经邦弘化，康济时艰”为治学的主旨。李颢提倡“匡时要务”。张履祥主张以“治生”为主，读有用之书，“留心世务”，“务经济之学”。王源在《平书》中提出与黄宗羲“工商皆本”有同样意义的“唯农为有田”，开了二十世纪初“耕者有其田”的先声。陈确、颜元等批判束缚个性的“存理灭欲”论，大胆抗言“天理正从人欲中见”，初具启蒙的人性论。熊伯龙的《无何集》，集无神论思想之大成。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开始了近代科学与哲学相结合。这

时期最突出的是王夫之的哲学，他在《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一系列具有丰富思想创见著作中，提出“气无生灭”、“气者理之依”、“天下惟器”、“能必副所”、“体用相涵”、“动静皆动”、“变化日新”、“知行相资”、“格致相因相济”、“义利统举”、“性日生日成”、“理势相成”等等光辉命题，对古代哲学作了全面的深刻的总结，并把它发展到新阶段。孙奇逢亦不愧为明清之际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直至耄耋之年，仍然不分日月昼夜，至秉烛笔耕，著作达一百六十多卷，其中《理学宗传》、《道一录》、《圣学录》、《北学录》、《洛学编》为理学提供了系统的思想史料。特别是《理学宗传》，虽为黄宗羲评为“疏略”，杂收而无区别，批注亦未得要领。然其书早于《明儒学案》近二十年，亦有其特色，却是一部有源有流、线索清楚的系统的理学专史著作，未必对黄宗羲完成《明儒学案》无借鉴作用。其《四书近指》、《书经近指》、《读易大旨》等，更具较高学术价值。人们在论述孙奇逢学说时，往往沿袭前人成说：“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前者主于一“心”，后者则侧重于“理”，由此而认为他只是兼采朱陆，调和理学与心学，从而在评价其某些即使是新见时也不免受到限制，以至被忽视。其实，孙奇逢亦有不少可贵的见解。他针对王学流于空虚和朱学僵化之弊，提出以实补虚，以虚泄实。强调“经世宰物”、“躬行实践”、“主于实用”。又把学术史划分为上古、中古和近古，各按元亨利贞四阶段运行，具有鲜明的发展进化观。在《书经近指》中，他发挥“放伐”论，以及对封建朝代兴亡归之于“天亡”、“天弃”与“民亡”、“民丧”，同样表现了对封建君主专制的谴责和民主政治的期望。如此等等，都足与黄宗羲、顾炎武、陈确、李颀等人思想相映生辉。

孙奇逢在近一个世纪的奋斗不息的生涯中，高风亮节，光明磊落，体现了明清之际思想家的品格。从几件主要事件可以证明：其一，营救东林正直人士。明末宦官专擅，浊乱朝政。天启五年。魏忠贤阉党诬陷左光斗、杨涟、魏大中等受抗清得力将领熊廷弼贿

赂,加以逮捕后严刑索“脏”。当时孙奇逢与鹿正(鹿善继之父),学生张果中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挺身营救,时人赞他们刚正重义,有功于世之举,为“范阳三烈士”。其二,抗清保民。崇祯二年、九年,清兵突关侵扰,孙奇逢两次组织带领民众,击退来犯,保住家乡容城安全。崇祯十一年冬,又率领数百户乡民转移到易州五峰山,结寨自保。还极力支持和鼓励学生王生洲、茅止生投奔南明政权抗清。明亡后,黄宗羲倾家募兵,抗清于四明山。王夫之于清顺治五年(1648)与密友管嗣裘等在衡阳举兵抗清,均同属武装斗争。其三,拒不仕清,坚持民族气节。满清本是明朝疆域内的地方政权,入关统治全国后,是地方政权取代中央政权,本为封建政权易姓改号,可在当时严“华夷之辨”的儒士看来,却是不能接受的“异族”统治。从历史发展观来说,亦未可否定他们的民族气节。清廷为了笼络人才,曾开博学鸿词科等征诏儒生,仅孙奇逢就有五次,并许以国子祭酒尊位厚禄,孙奇逢蔑视这种位禄,拒不赴召,与傅山等人一样,临大节而不夺。其四,躬耕教学于苏门山夏峰村。孙奇逢的容城家园田地被清贵族圈占后,被迫举家南迁,到河南辉县定居后,固穷林泉,在著书立说的同时,创办书院,授徒讲学,造就人才,门弟子达数百人,其中有汤斌、费密、耿介、张沐、魏一鳌等这样一批著名学者。其教学活动影响了清初北方一代学术。这足可与黄宗羲在浙东恢复证人书院,培养了万斯同兄弟等相媲美。作为教育家,又可称为一代宗师。《清史稿·儒林传》首列其传。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为其独立立案,江藩的《宋学渊源记》以及其他史籍,均有其传,对其作为明清之际一思想家,予以肯定。

从孙奇逢一生事迹和学术思想来看,我们有足够理由放开眼界,不局限于前人成说,重新评价孙奇逢及其思想。基于这一观点,我十分赞佩李之鉴教授作孙奇逢哲学思想新探。李之鉴教授是我多年之交,我最早读到他的大作是编入198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宋明理学》中的《论陆九渊的宇宙观及其时代作用》,当时